

我笔写我思

邓伟志

思想人生⑤

我这个人从懂事开始,没有一天离开过笔。解放前读初小时,用含有白色粉末的小石头当笔,写在半尺宽、不到一市尺长的小石板上。语文、算术考试,我们把答案写在小石板上,然后把小石板举起来,给老师看,听老师打分。现在条件好了,用电脑写作,因为我的口音、拼音不准确,我使用汉王笔在电脑上写。笔是我表达思想的第一工具。朋友讲,笔是我的“老性命”,也有道理。人家是马不停蹄,我是笔不停写,几十年来,发表了的1200多万字,出版了《邓伟志全集》25卷。

我1960年本科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3月下旬毕业论文刚交上去,3月30日我便被分配到全国第一家毛主席著作学习室。上海社会科学院学习室是为迎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而设的。迎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说明第四卷还没出版。于是我自编《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我以夜继日、一张不漏地翻阅了1945年以后的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华北《人民日报》以及国民党的报纸。两党的报纸一对比,促使我更加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

1960年6月10日,我的毕业论文《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改善人与人关系》,忽然发表在当时位居全国学术刊物前三名的《学术月刊》上。这是我做梦也不敢想的,当时在大学生中也引起了小小的轰动。现在看,此文多少有点“左”的成分。1962年,我被调进中共中央华东局政治研究室一组。这个组对外称“一组”,对内称“学习组”。学习组除组长外,三个组员一人读《马克思全集》;一人读《列宁全集》,这就是我;还有一位读《斯大林全集》。当时我还没成家,有的是时间,我匆匆通读了一遍以后,反复读了列宁“十月革命”前后的著作十来卷。

《毛泽东选集》加《列宁全集》让我坚定了向科学共产主义信仰。因此我对1991年以后一些人刘对列宁的批判不太满意,认为他们有以偏概全的毛病。列宁谈了那么多“自由”,有人却认为他反对自由;列宁在批判布哈林时多次肯定布哈林的可爱之处,却有人说他犯有全盘否定布哈林之“罪”。我总觉得批判列宁者似乎没读多少列宁的书。马列主义需要与时俱进,不是吗?他们不了解一二百年后的“数字化”,但我坚信其主流是推翻不了的真理。

“邓氏三论”的前前后后

“文革”期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开始给自然科学家“出路”,可是很多社会科学家还在“牛棚”里。我坚信“自然科学保险,社会科学危险”,恰巧此时毛主席指示要研究“四大起源”,于是我就改行搞自然科学,主笔写了《天体的来龙去脉》《人类的继往开来》

之江青年论坛

“枫桥经验”作为一种具有浙江辨识度的地方治理典型方案,蕴含着兼收并蓄、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等特质。当前,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已经成为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积极适应数字化治理情境,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基层治理实践、理论、制度创新的必然要求。

秉持数字化理念,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注入“三式三性”的数字化思维和数字化特征。遵循分布式思维。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运行规律,体现了分布式思维特征。这就要求整合分散在党委、政府各条块以及市场、社会各领域的治理资源和治理力量,持续深化“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遵循节点式思维。数字和数字运算还有明显的节点串联整个数字系统。这就要求在基层治理创新中发挥关键节点的作用,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整体跃升。遵循颠覆式思维。数字化对社会发展的冲击是颠覆式的,在推动基层治理数字化时要敢于突破传统思维窠臼。体现系统性特征。资源的有限性是包括基层治理在内的所有管理活动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就要体现“理性计算”的思维特征,用尽可能低的成本产出尽可能大的治理成效。体现系统性特征。充分发挥互联网和物联网带来的

两本书,并参与了《自然辩证法》杂志的编辑工作。

由于搞了自然科学,在“文革”中就少写了错误文章。1977年元旦刚过,我就被调到红旗杂志社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1978年初又被借调到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身边,参加全国科学大会的简报工作。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展时,我在友谊宾馆听了中央党校吴江的报告,胆子开始大起来,写了《越鸿沟记》。

做学问不可能没争议,争议也可以成为推力,推动逻辑更严密、概念更准确。一触即跳不是学者应有的气度。1980年,我提笔写了《家庭的淡化问题》,发表在《文汇报》上。社会上对这篇文章讨论得正热闹时,我又发了《淡化当官心理》。在报考公务员的人数快成天文数字的时候,这篇文章又出现了正反两种意见,甚至出现了扣政治帽子的现象。我牢记毛主席“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的教导,来了个什么商榷的商榷,写了《中国的学派为对这么少?》,又引发了一场争论。好在胡耀邦同志认为我这篇文章对于“繁荣学术事业、贯彻‘双百’方针是有益的”,《文汇报》发了几篇支持我观点的文章。接着,有文章概括出“邓氏三论”,称我是“思想界的男子汉”。

《不创新,毋宁死》一书的由来

我大学毕业后接触的大学问家比较多,他们都教导我写文章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吃人家嚼过的馍”,陈言务有。还有位笔杆子告诉我:“大文章(指套话连篇的长文)是小文章(看几句就不看了),小文章(指言之有物的有新意的短文)是大文章(读者会从开头看到尾)。”前辈的话让我刻骨铭心。

1999年我写了篇《不创新,毋宁死》,提倡理论创新。一位我熟悉的领导看了,半开玩笑地说:“我没创新,不还活得好好的嘛!”下面的人闻风而动,“拾个棒子打个‘针’(真)”,立即要发表我文章的刊物主编检讨,声明文章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主编思想想去,觉得文章没什么大错,迟迟不检讨。好在他的顶头上司开明,对主编说:“你就承认‘知识不足’,我们就可以汇报上去说你检讨了。”

因为没有对我当面批评,我故意在会上讲:“有人随意把无产阶级自由化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怕争论,公开发表文章说:“我的名字叫邓伟志,号叫‘邓争议’。”我尊重批评,但不轻信批评,学会分辨米粒与稻壳。

理论不仅在创新,而且还要勇于坚持创新。放弃真理就是学术变节。我一不做、二不休,在《人民政协报》头版发表了《敏感点是学术生长点》。“不确定因素”不是护身符,理论界有责任从“不确定因素”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我锲而不舍,陆续在另外一些报刊上为创新大声疾呼,铁杵成针,于2006年出了本名为《不创新,毋

宁死》的小集子。

“贫困社会学家”的光荣称号

有人戏称我为“贫困社会学家”,不是空穴来风。一则是因为我为一个理论团体题词:“生活简单点,头脑复杂点”;二则是我写过《论乞丐》等数十篇论述共同富裕的文章。社会学讲“社会平衡论”。不平则鸣,不平社会不太平。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大写多写共同富裕。

有人在会上着重批评“仇富”,不提“嫌贫”。我立即发言讲:“先有嫌贫,后有仇富。嫌贫、欺贫、压贫是矛盾主要方面。”

讲人均收入是应该的,但是只讲人均不讲差距是片面的,是脱离实际的。我曾在广东西部一个县的县报上看到一个段子,触动我灵魂。报上写道:“张家有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家家都是张百万。”中国社会的收入结构一度是哑铃型,不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不要说作为一名学者,就是没文化的人,也在为这个问题着急。

我为什么关心共同富裕问题,是因为我访问、调查过贫困地区。上世纪80年代初,我跟随领导去过因缺水一年只洗三四次澡的地区。他们家家没衣柜,就拉了一根绳子。一个人只有两件衣裳:冬天穿棉衣,把单衣挂在绳子上;夏天穿单衣,把棉衣挂在绳子上。我还去过1953年之前男女老少从来没有吃过一粒米、没有穿过一件衣的少数民族地区。《孟子》里有句名言:“人皆可以为尧舜。”穷得没有裤子,怎么成尧舜?“情动而辞发”,我毅然决然提笔论述实现共同富裕的迫切性。

有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能呢?有!1963年,我跟随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长罗毅和浙江社教副团长陈伟达在浙江萧山县搞社教,参加他们的三级干部会。台下除女同志穿上衣外,男同志几乎都赤膊,背上、脖子上的刮痧“昭然若揭”。可后来萧山县改区,如今位列“综合实力百强区”第5名,先富帮后富,正在成为共同富裕的领头雁。前面提到的1953年前不穿衣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今青年人手机比我还会玩,人车比不大城市低。中国缩小阶层差距、性别差距、地区差距,实现“环球同此凉热”,指日可待!

为社会治理建言

我的本职工作是从事社会学研究。几十年来,我同社会学界同仁一起为改进社会治理出大力、流大汗。

以文传意。1986年,我在珠海的刊物上提出“社会改革”。上世纪80年代,在有人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导、忽视市场经济时,我遵照党中央的革新精神,多次著文为市场经济鼓与呼。在出现只注重市场经济、忽视社会建设的现象时,我出版了《市场经济的若干社会功能》一书,获中国图书奖。在社会上流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并争夺这

句话的发明权时,我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出从根本上说,应当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在出现过度行政化苗头时,我大胆提出在社会建设中要充分发挥社团作用,提出成年人参加5个社团,社会才能活跃起来。在讨论法治、人治时,1994年6月1日,我在《团结报》发表文章,加了条“德治”。后来对德治展开讨论时,2001年,我又在《民主》4期上发表了《德治的重心在哪里》。在腐败滋生时,我写过《廉政十法》,为多家报刊转载。为了落实“人民至上”,我论证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决定权之间的关系,强调当务之急是应当扩大知情权,不知情谈不上参与、监督。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之后,我欣喜若狂,接二连三写了几本有关和谐社会的书。在形式主义泛滥时,我开“顶风船”,批评有些人在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呼吁简化繁文缛节。在网络兴起时,我提出过去社会学只讲血缘、地缘、业缘,现在应破茧化蝶,加个“网缘”。近来,元宇宙开辟了个“虚拟世界”,我又从社会学角度提出《元宇宙的社会学之问》,迎接元宇宙光临人间。

学而不思则罔。我笔写我思。“读+走+写”是我的治学方程式。现在我已进入耄耋之年,只要一息尚存,还要继续把点滴的思绪写出来,请读者评议。人民是最高评委。

名家小传



邓伟志,1938年生,安徽萧县人,研究员、编审,上海大学终身教授,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1960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先后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工作。

著有《家庭的未来》、《妇女学呐喊》、《社会学文集》、《邓伟志文集》(6卷本)、《邓伟志全集》(25卷本)。主编《社会学辞典》《大辞海·政治学社会学卷》。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辞书学会副会长、上海作家协会常务理事等。



扫一扫
看视频

对策研究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要深度融合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品质消费普及普惠体系。过去五年,浙江文化和旅游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渠道。站在新的更高起点上,要促进文化和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助力实现省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应抓住五大着力点:

一是抓住“放管服”改革这一“撬动点”。“放管服”改革是推动文化和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变量”。我省自2019年推行文化和旅游行政审批“全省一网通办”服务模式以来,先后实施14项“告知承诺”事项、下放12项行政审批事项,实现全省文化和旅游领域告知承诺全覆盖,行政审批“应放尽放”,“放管服”改革杠杆效应应全面释放,有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下一步,应持续提升完善文化和旅游领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积极推进其他营业性演出审批“一件事”改革等举措,更好落实“减证便民”“提效惠企”,让改革创新“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二是抓住“信用+监管”这一“关键点”。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监管”是提高传统市场监管手段效能的增强工具。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局出台《浙江省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评价管理办法》和《浙江省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工作实施方案》,率先建设“文化和旅游信用监管平台”,常态化推行演出经纪机构、旅行社等市场主体信用评价和分级分类监管,初步形成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监管“浙江模式”,有效完善和提升文化和旅游市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效能。接下来,要在《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等法规指引下,完善信用监管系统,推进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公示,拓展信用应用场景,依法依规健全跨行业、跨部门的信用联合奖惩机制,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三是抓住“互联网+监管”这一“赋能点”。“互联网+监管”是建设数字政府、提升监管效能的重要手段。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局迭代升级“浙山一张图应急救援服务”系统,综合采用GPS、报警桩等技术手段,对游客实现更精准的定位,并通过系统整合应急救援力量、打破信息沟通壁垒,有效破解山地旅游安全监管难题。接下来,要进一步推动导航定位、可穿戴设备、电子围栏、遥感卫星等技术和设备在自助旅游、特种旅游中的运用,通过大数据采集分析加强旅游市场安全监测,提升旅游领域突发事件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运用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手段,构建以动态监管、移动执法、应急指挥、风险预警为核心的智慧型全流程市场监管新模式,推进监管能力现代化。

四是抓住新业态发展这一“趋势点”。近期,针对不断升温的露营热,浙江省旅游专班出台《关于完善露营旅游规范管理的意见》,进一步加强对露营旅游的规范管理,引导露营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对于露营、“剧本杀”等文化和旅游新型消费业态,既要重视其对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全面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又要正视其存在的基础设施不足、服务能力偏弱、监管规范滞后等突出短板和问题。要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为文化和旅游市场新模式新业态留足发展空间,同时坚守质量和安全底线,将其纳入监管视线,“量身定制”监管规则和标准,推动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五是抓住服务质量提升这一“支撑点”。服务质量是文化和旅游市场的“生命线”。近年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局加快建设“浙文惠享”“旅游通”等数字化改革重点应用,大力实施以“品标引领”“品牌创建”“浙里优宿”“旅行焕新”“阳光娱乐”为主题的文化和旅游服务质量提升五大专项行动,联合省市场监管局推出《“品字标”浙江服务》《品质饭店评价规范》《品质旅行社评价规范》等“品质系列”地方标准,用好退还6亿元旅行社质保金、3亿元旅游消费券、1亿元旅行社奖补金等政策工具,全面助推市场主体提升服务质量、服务水平。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只有通过有效手段,不断促进广大市场主体提升品质、精进服务,造就抗市场波动、逆周期调节的“好身板”,才能充分支撑、整体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持续壮大、蓬勃发展。

总之,新形势下,我省文化和旅游市场高质量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唯有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加强全局性谋划、系统化治理、品质化提升,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和支撑体系,才能开创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新局面,为“两个先行”加力赋能。

【作者单位: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

观点万花筒

提振信心需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张军扩在“2022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指出,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一个需要高度重视和解决的问题是市场主体信心不足。

张军扩认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2.5%,已经是一个来之不易的不错的成绩。但相关调查显示,企业发展信心指数较低,不少企业调整或延缓了投资扩产计划。市场主体信心不足,不仅会影响短期需求和短期增长,更影响中长期发展后劲。尤其是企业预期和信心具有循环加强和自我实现的特点,不论实际情况是好是坏,只要普遍预期不好,实际情况就可能就会变糟;相反,如果普遍预期乐观,实际情况可能就会好起来。另外,市场主体信心不足也有可能成为经济社会风险的重要诱因。所以,信心比金子更重要,稳增长必须首先稳信心。

张军扩表示,市场主体信心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对策之策必须长短结合、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当下主要应从以下五方面着力:

一是以科学的态度精准高效地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短期来讲,疫情是影响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的最大不确定因素。所以,下半年稳增长、稳信心,科学精准的疫情防控仍然是关键。首先必须全面理解和切实贯彻中央提出的“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精神和要求,切实做到统筹兼顾,严格落实“九不准”,坚决杜绝层层加码,尽量减少疫情防控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转的干扰。同时,我国的疫情防控政策也需要根据疫情特点和形势变化不断进行动态化和调整。

二是扩内需的政策要持续用力。要提振市场主体信心,不仅要通

过各种救助措施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更需要促进需求恢复,让市场主体有订单、有收入、有钱挣。为此,首先要继续抓好已出台政策的落地见效,包括贷款延期付款政策、稳岗保就业政策、降成本政策、购房信贷政策等。其次要努力保持扩内需特别是促投资的政策力度。

三是要着力提升政策的透明性和可预期性。现阶段,无论是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还是房地产去杠杆控风险、调整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等,都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须之策,但这些都政策的调整,都会导致相关企业运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其竞争力状况、盈利水平等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此,政策的调整,需要充分考虑对企业的影响,政策的颁布要有一定的提前量,从而给相关企业的调整留下一个必要的合理的过渡期。

四是优化营商环境要进一步走深走实。当前相关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突破。比如一些领域还存在较为严重的所有制歧视问题,一些地方“新官不理旧账”、拖欠企业账款等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等。要加强理论创新、夯实制度基础,通过深化改革来破解。

五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关键领域改革开放取得更多更大的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影响市场主体信心最大和最根本的因素。7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提出,要以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增动力,并对国企改革、平台经济监管、深化对外开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也可以对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发挥重要作用。

重要窗口 理论周刊·知行

吴斌

【作者为绍兴市党校枫桥经验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